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研究文库

主编◎李建平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

中国传统道德概论 (修订本)

陈桂蓉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专辑
专辑主编 苏振芳



中国传统道德概论 (修订本)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

陈桂蓉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道德概论/陈桂蓉主编. —修订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6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研究文库)

ISBN 978-7-5097-5126-8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伦理学-研究-中国
IV. ①B8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5548号

·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研究文库 · 中国传统道德概论 (修订本)

主 编 / 陈桂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统筹 / 王 绯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孙燕生

责任校对 / 李秀军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126-8

定 价 / 59.00 元

印 张 / 16.25

字 数 / 279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文库编委会

主 编：李建平

副主编：廖福霖 苏振芳 何贻纶 李建建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岗峰 刘义圣 何贻纶 李建平

苏振芳 陈少晖 陈永森 陈桂蓉

吴有根 张华荣 杨立英 林 卿

林子华 林旭霞 林修果 郑又贤

郑传芳 赵麟斌 郭铁民 黄晓辉

俞歌春 蔡秀玲 廖福霖 潘玉腾



福建师范大学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研究文库

总序

神州大地风雷激荡，海峡西岸春潮澎湃。福建师范大学省重点高校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研究文库》与大家见面了。

本文库以坚持、发展和弘扬马克思主义为宗旨。这既是神圣的使命，又是历史的责任。马克思主义问世已经一个半世纪了，尽管她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围攻、谩骂、禁锢、歪曲……但仍顽强地成长、广泛地传播、蓬勃地发展；尽管也有成百上千种理论、学说来与之较量，企图取而代之，但都无法得逞。“苏东剧变”虽然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但无损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马克思主义者在认真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后，将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更纯洁、更成熟，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当 20 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举行过一次“千年风云人物”网上评选。结果，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思想家，得票高居榜首。中国共产党人 80 多年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取得了革命和建设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一个贫困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中国。在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共产党人再次庄严宣告，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并且以极大的决心和气魄，在全国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宏大工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在于她具有以下五个突出的品格。

一是科学性。一种理论、观点能称为科学，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合理地解释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其中的一些难题、怪象；二是有效地预见未

来，并为尔后的实践所证实。列宁在评价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发现之一唯物史观时这样写道：“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如何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资本主义。”^① 中国改革开放 20 多年的实践已向世人有力地证明中国所选择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而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所鼓吹的“中国崩溃论”等论调则是完全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这就要求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针对林彪、“四人帮”肆意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是十分正确的。同样，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的学说也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在这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还做得不够理想。例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主要通过恩格斯、列宁，甚至斯大林的著作来了解，而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应用的十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则研究得不多。《资本论》虽然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的这一特殊的市场经济，但同任何特殊事物中都包含着一般一样，透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特殊”，马克思也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这个“一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同样适用的。因此，我认为要从现时代的观点重新解读《资本论》，发掘那些有益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东西。学术界有人提出要“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与马克思同行”，但最重要的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写道：“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② 因此，我们对待马克思的著作，对待马克思的一系列“伟大发现”，也要采取“无比认真的态度”和“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只有以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才能产生科学的结论。

二是人民性。列宁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③ 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31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 4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305 页。

隐讳，她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但是，无产阶级又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当然是核心部分。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相一致的，而且，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反映无产阶级利益的学说，同时也是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学说。阶级性和人民性本质上是相一致的，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在革命战争年代，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十分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性的同时，应该强调她的人民性，强调马克思主义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开展荣辱观教育等理论，一经问世就广为流行，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就是因为它们具有鲜明的人民性。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我们把人权看成是资产阶级的观点，采取回避、批判的态度，结果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经常处于被动境地。这一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根本变化。1991年11月1日中国正式公布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又称《中国人权白皮书》），高度评价人权是一个“伟大的名词”、“崇高的目标”，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以此为开端，中国掀起了研究人权、关心人权、维护人权的热潮，人权理论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人权理论在我国所发生的变化，说明人民性的确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是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①毛泽东同志在将近70年前讲的这段话，至今仍十分正确。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因为她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为全人类的最后解放指明了正确方向；但在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时，又要同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能生搬硬套，不能搞教条主义。实践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19世纪，但她没有停留在19世纪。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150多年来，她始终与时代同行，与实践同步。党的十六大把“与时俱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84页。

进”作为中国共产党新时期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把能否始终做到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当做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高度重视和深刻体现。

社会实践是检验科学与非科学、真理与谬误的巨大试金石。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时，西方一些人兴高采烈，并且迫不及待地兜售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把它当成是解决各国社会经济危机、走向繁荣富强的灵丹妙药。但实践表明，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非但没有摆脱危机，反而陷入了更深重的灾难，“华盛顿共识”不得不宣告失败。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绩。中国的成功实践已在国际上逐步形成了“北京共识”，这既是中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胜利，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四是战斗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写道：“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①由于马克思主义公然申明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所以从她一问世，就受到了敌人的百般攻击，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马克思一生中的主要著作大多是和资产阶级思想家进行论战的记录，就连《资本论》的副标题也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②可是，当马克思逝世的时候，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恩格斯十分公正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③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已经处于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全党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推进现代化建设而努力。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从国际看，西方敌对势力把中国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对手，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不会改变。从国内看，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78页。

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进一步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出现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也就不可避免了。面对这种挑战，我们不能回避，不能沉默，不能妥协，更不能随声附和、同流合污。苏联、东欧的前车之鉴，我们记忆犹新。我们应该表明态度，应该奋起反击，进行有理有据有说服力的批判，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尊严。例如，有人肆意贬低、歪曲、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企图动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厦的基石，难道我们能听之任之吗？有人千方百计地要把“华盛顿共识”推销到中国来，妄图使中国重蹈拉美、俄罗斯、东欧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覆辙，我们能袖手旁观吗？当然不能！这不仅是党性立场所致，也是科学良知使然！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德国工人运动的老战士、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朗茨·梅林学习，他在一个世纪前写的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文（已收入《保卫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苏联1927年版，中文版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今天读来仍然感到新鲜和亲切。

五是国际性。1848年，当马克思、恩格斯出版《共产党宣言》，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时，就注定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超越地域、肤色、文化局限的国际性的思想理论体系。当今，方兴未艾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正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进程，尽管这种影响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会给许多发展中国家造成消极的甚至是严重的后果。这已为许多事实所证明。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扬善去恶，除了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外，别无其他更好的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和迫切。西方垄断资本出于维护其根本利益的考虑，竭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综合国力不断强大、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兴趣日益浓厚。因此，“北京共识”、“中国模式”逐渐成为国际论坛的重要议题。看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向世界，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85年发展的必然，也是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形势发展的必然。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感到自豪，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应该要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不仅要关注世界的风

云变幻，也要了解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动态。要积极推进国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世界各国朋友所了解，并与他们一道，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以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五大品格，也是本文库所遵循的指导思想。福建师范大学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与研究，20多年来在本科生、研究生中坚持开设《资本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原著课程，出版、发表了许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论著。学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迄今已获得理论经济学、历史学、中国语言文学等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等二级学科博士点，培养了一大批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学术骨干。2006年初，学校整合相关院系师资，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本文库是学校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阵地，也是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本文库初步安排10辑。大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经济学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研究等。每辑出若干本著作，计划用10年左右的时间，出版100本著作。本文库的出版得到福建省重点高校建设项目的特别资助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胡锦涛同志十分重视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勉励参与这一工程的学者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满腔热忱地投身这一工程，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研究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段语重心长的话，也是本文库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是为序。

李建平

2006年3月31日

绪 论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中，传统道德始终以独特的风采和巨大的魅力闻名遐迩。作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涵盖之广博、内蕴之精深难以估量。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核心。中国传统道德通过道德价值观、道德理想、道德信念、道德规范等逐渐深入人心，并化作中华民族的灵魂，成为民族精神之所在。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精髓，已经深深融化在传统文化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中国传统道德概论》一书，以推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己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审视与观照传统道德生活。并力图通过对传统道德的优劣甄别以及对优秀道德文化的发掘与整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

中国传统道德，一般说来，指的是从先秦到辛亥革命时期，以儒、墨、道、法各家伦理道德传统为主要内容的伦理思想和道德实践活动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对此，必须把握几个问题：第一，中国传统道德所赖以生长的历史时代主要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即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王朝，到1848年的鸦片战争。在此之前的春秋战国属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由于这个时期产生了我国古代的伦理学说，该学说对以后的封建社会产生了直接、深远的影响。所以，中国传统道德当从先秦始。鸦片战争之后，我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始终不能动摇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道德。辛亥革命之前，我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文化仍然是中国传统道德。所以中国传统道德当以辛亥革命止。第二，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内容是儒、墨、道、法各家思想的有机融合，但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原因，儒家思想在其中占有主要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

内，无论是从影响的广度还是从思想渗透的深度，儒家思想的影响力都是最大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道德的主要表征。第三，中国传统道德是一个由道德理论和道德生活的行为规范构成的有机体系。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们的道德就呈现出两种形态，即现实生活的形态和思想观念、学术理论的形态。前者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国家民族、经济政治，小到衣食住行、婚丧节庆，无所不在。后者则是人们对于前者的理论把握。伦理思想作为反映和概括道德生活实践的理论，是整个道德体系的灵魂和核心。它来源于人们实际的道德生活需要，却又成为建立一定道德规范的理论基础，成为人们道德思想和行为的指导依据。上述对于中国传统道德的界说，有助于我们从内涵和外延上把握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内容，认识它的历史地位及作用。

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历史分期大致有三：先秦时期；秦汉隋唐时期；宋元明清时期。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孕育形成时期。夏、商、周奴隶制时期，维持社会生活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相继产生（如周公所制“周礼”，设立周代典章制度；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道德命题），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伦理学说体系。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一批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出现，人们才开始对道德这一社会现象展开广泛的研究和理论探讨，从而形成了古代的伦理学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主要的伦理学说有四大流派：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之后儒家分化为两大支：一支是孟轲学派，一支是荀况学派。儒家伦理学说的基本观点是以仁义道德为人类行为的准则，认为道德生活高于一切。儒家对道德理想、道德观念、道德范畴、道德规范、道德的社会作用、善恶评价标准以及道德修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为中国古代的伦理学说奠定了基础。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家是从儒家中分化出来的反对派。这个学派同样提倡仁义道德，但对仁义道德的解释和理解与儒家有异。墨家认为，道德生活不能脱离功利，“兼相爱，交相利”是他们的重要主张。墨家可谓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功利学派。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之后道家分化为两大派：一是以庄周为代表的老庄学派，一是以齐国道家为首的黄老学派。道家是儒墨两家的反对派。其中老庄学派虽然也讲道德，但他们反对儒墨两家以仁义为道德的内容，提出了“无为说”，并以此作为道德的原则。庄子又把老子的道德说引向脱离人类社会生活的非伦理主义。黄老学派则与法家合流，容纳

了法家的一些思想。法家有前期与后期之分。前期法家分为以商鞅为代表的流派和以齐国的慎到等人代表的流派。前者是从儒家分化出来的反对派，后者是从道家分化出来的反对派。后期法家的代表是韩非，他综合了前期法家两派的学说，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如韩非提出以“法”为主，倡导法、势、术三者相结合的思想。法家伦理思想的共同特征是反对儒、墨、道三家的观点，既不赞成儒家的道德决定论，又不赞成道家的独善其身说。他们不一般地排斥道德规范，而是认为法制的社会作用高于仁义教化。他们提出“废私立公”的学说，并将之视为人类行为的准则。除了上述四大流派之外，这个时期在伦理学上有较大影响的，还有战国时期的杨朱和告子。杨朱主张“贵己”“为我”“全生葆真”，以个人生命为最大利益。告子主张“生之谓性”，“食色，性也”，主张人性无善恶。

秦汉隋唐时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抽象发展和大一统、封建化时期。在先秦时期，中国伦理思想体系的基本要素已形成，但没有一家能占主导的或统治的地位。秦汉隋唐时期，中国伦理思想继续发展并达到大一统和封建化状态。这一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与文化选择的能动性相结合的过程又可大致分为三个小阶段：两汉儒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

两汉以后，儒家伦理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儒家伦理最能体现中国社会的特质和国情，其理论本身也发展得最为完备。秦汉之际，《礼记》成书，由此作为日后中国伦理精神生长的元典和本体的“四书”伦理体系事实上已经形成。《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它是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提炼和概括。《大学》提出“三纲领八条目”。“大学之道”，是培养统治阶级理想人格的途径。“大学精神”就是“内圣外王”的精神，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家国一体的原理和儒家伦理政治的本质。《中庸》揭示了儒家伦理中“天人合一”的中庸境界与精神模式。从此，“极高明而道中庸”成为中国人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

《大学》《中庸》，标志着儒家伦理的成熟。但它并不就是封建伦理。中国封建伦理的真实形态是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论。秦汉时期，封建社会制度确立。以等级制为特点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其相应的地主阶级内部结构形成，按身份门第划分等级，社会上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与此相适应，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登上了统治地位。“三纲五常”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古典儒家伦理既有内在联系又有原则区别。“三纲”由“五伦”发

展而来，它抓住了“五伦”中最为重要的君臣、父子、夫妇三伦，并以此作为人伦的根本。应该说，这种提炼突出了中国国家一体的社会结构和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中最本质的方面。但是，先秦儒家讲的“五伦”关系是一种双向的相对关系，而“三纲”关系则是单向的以人身依附和服从为原则的绝对关系。“五伦”虽然强调宗法等级秩序，有“夫义妇顺”等歧视妇女的内容，但它以君臣、父子、夫妇的互惠互动和在上位者的率先垂范为前提，具有浓厚的人情味。而“三纲”则使伦理关系完全服从封建的政治关系，使双向的人伦义务变成片面的等级服从，使得人对人的关系，变成人对礼、人对份位、人对纲常的单方面的服从关系和义务关系。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三纲”是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异化。董仲舒以后，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成为不可动摇的名教或礼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使得儒家伦理陷入尖锐的冲突之中。道家精神的潜在影响，使中国伦理精神系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态——玄学伦理。玄学伦理试图调和儒道，力图将儒道结合以克服人的精神和伦理生活中的矛盾。其特点是“托好老庄”，用道家的“自然”价值观对儒家的“名教”进行评判。这一时期的玄学家有阮籍、王弼、向秀等。但玄学伦理的片面发展，形成了一种苟且偷安、纵欲混世的人生态度。于是，中国伦理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形态——隋唐佛学。

隋唐五代时期，是封建社会上升，以及封建主义道德生活发展与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封建经济发展，工商业兴旺，文化昌盛。身份等级特权的门阀世族开始衰落。普通地主和农民要求摆脱依附等级关系，“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此间出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和吴兢的《贞观政要》等高度圆熟的道德经验。隋唐封建统治者为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一面推崇儒家，一面又尊道礼佛，实行儒、佛、道并用政策。五代以后，随着佛教在民间广泛流行，佛学的伦理观和道德思想进一步与中国民间的伦理道德观念相结合，逐步形成了适应中国社会特点的中国佛教伦理思想。佛教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能成佛。认为人生是苦海，而苦来源于“无知”（对佛教真理的无知）。解脱苦海，“无知”不存，而进入涅槃成佛，是佛教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和目标。佛教主张以“戒”“定”“慧”三学除“贪”“瞋”“痴”三毒。并提出“六度”，即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作为从生死此岸到涅槃彼岸的方法与途径。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辩证综合时期。也是封建主义道德发展的顶峰与衰败、没落时期。宋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当时社会相对稳定发展，经济中心南移，以官僚地主阶级为支柱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了建立与加强。儒家吸取佛、道而形成的理学逐渐发达，封建道德教化日益深入人心。宣传封建道德和忠孝节义的学校书院、教材读本、乡规民约、戏曲小说等大量出现。封建道德深入穷乡僻壤，使老幼皆知。

这一时期，儒家伦理因融合了道学、玄学和佛学，而成为有别于古典儒学的“新儒学”。新儒学伦理最重要的学派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程朱理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天理”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本体。“人伦者，天理也”。^①“理者，五常而已”。^②人伦五常就是天理。经过这个转换，人间的伦常之理便上升为天道的法则，实现了“天道”与“人道”的统一。这种理论不仅为纲常名教找到了本然的根据，而且也使之具备了神圣性与永恒性。它表面上是以“天道”说“人道”，实际是把“人道”上升到“天道”的高度。在此基础上，程朱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认为天理人欲不容并列，其本质的区别是“公”与“私”的对立。“己者，人欲之私也；礼者，天理之公也”。^③二者对立的实质就是对纲常礼教秩序的维护或破坏。这种伦理思想，一方面提倡整体价值观，在理欲对立中突出人性的尊严及其道德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它又与封建政治结合而沦为道德专制主义，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

陆王心学的基本范畴也是“理”，其基本宗旨也与程朱理学相同，即维护封建政治秩序的长治久安。二者的区别在于，陆王认为“理”不是外在的客观实体，而是人的“心”或“良知”的先验结构。心与理是一个东西，社会伦理规范与主观道德观念都根源于人心，因而提出“良心”概念，认为它不但是道德的根源，而且先验地具有辨别善恶的能力。人的道德修养不需要像朱熹那样格物致知，而只要自识本心，存心明性。陆王心学的伦理思想受孟子的影响较大。而其思维方式又与“禅宗”的“即心即佛”一脉相承。陆王的根本目的也是要维护封建的“天理”，但“心”的主体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在理论上又会导致对“理”的反思与理性考察，甚至导致对

① 程颢、程颐：《外书》卷七。

② 朱熹：《晦庵集》。

③ 朱熹：《论语或问》卷一十二。

“理”的怀疑与否定。王阳明的“致良知说”要人们“破心中贼”，能动地进行封建道德修养。但由于它在理论上强调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倡导怀疑精神，结果适得其反，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封建道德的离心力，最终导致了宋明理学的自我否定。所以当戴震打破理学体系，揭露其“以理杀人”的实质后，宋明理学便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中国传统道德也必然要被现代道德代替。

（二）

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就其价值与特色来说，最为重要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天人合一”的理念。“天人合一”，指的是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家，一般都反对天与人相互敌对的观点，讲求天与人的统一。尽管在“天人合一”观上存在不同学说，但都力图追索天与人的相通之处，以求天人之协调、和谐与一致，把天人合一看作人生的理想境界。几千年来，“天人合一”的理念，在中国人心中深深扎根，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特质。

第二，关于“整体主义”的思想。“整体主义”，是古代封建统治者提倡的关于处理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关系的一种道德原则与伦理学观点。它抽象地强调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乃至为之牺牲。封建统治者要求的“整体主义”，实质是维护君王“家天下”的家族利益，进而达到维护封建国家利益的目的。然而“整体主义”思想也客观地铸就了中国人社会本位而非个人本位的伦理特质，培育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世世代代的志士仁人乐忧天下，为国家和民族忠诚敬业、赴汤蹈火、奋勇牺牲，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三，关于忠、孝、节、义的范畴。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中强调的忠、孝、节、义，是与古代宗法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周朝建立的宗法制度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基本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中的政治伦理性质。儒家的纲常伦理就是适应家国同构的社会制度的道德典型。臣事君要忠；子事父要孝；妇对夫要节。当人们的思想行为符合一定道德准则时，就是“义”。《中庸》所言：“义者，宜也。”墨家、法家也将“为义”“行义”看作行为价值的评价标准。“义”又往往与“利”对举，形成“义利之辨”，贯穿伦理思想史。

第四，关于人际和谐学说。人际和谐学说是中国伦理思想的一大特色。